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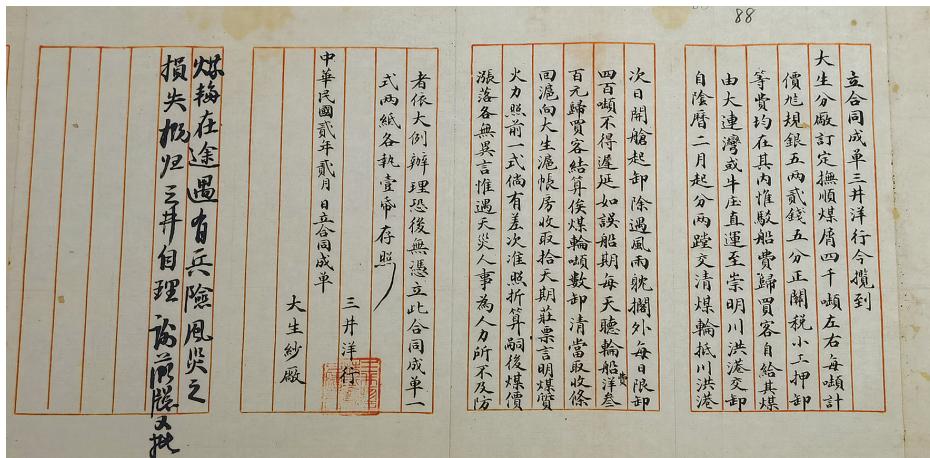
崇川往事

张謇与三井洋行

□徐宁



三井洋行今昔



大生公司与三井洋行购煤合同

2020年12月31日,在南通市档案馆、南通纺织博物馆、南通市图书馆、江苏省大生集团以及南通部分热心藏家的支持下,南通博物苑设计制作了《爱国企业家的典范、民族企业家的楷模、民营企业家的先贤——张謇》展。在众多展品中,有一份民国二年(1913年)大生纱厂和三井洋行订立的购煤合同引起了笔者的兴趣。合同全文如下:

立合同成单,三井洋行今揽到大生分厂订定抚顺煤屑四千吨左右,每吨计价规银五两二钱五分正(整),关税小工押卸等费,均在其内。惟驳船费归买家自给,其煤由大连湾或牛庄直运至崇明川洪港交卸。自阴历二月起分两趟(趟)交清。煤轮抵川洪港次日,开舱起卸,除遇风雨耽搁外,每日限卸四百吨,不得延迟。如误船期,每天听轮船费洋三百元,归买家结算,俟煤轮吨数卸清,当取收条回沪,向大生沪账房收取拾(十)天期庄票,言明煤质火力照前一式,倘有差次,准照折算,嗣后煤价涨落各无异言,惟遇天灾人事,为人力所不及防者,依大例办理。恐后无凭,立此合同成单,一式两纸,各执壹纸(纸)存照。

三井洋行 大生纱厂

中华民国二年二月 日立合同成单

合同的内容比较好理解,让笔者感到好奇的是,大生纱厂为何要向三井洋行买煤。根据马学新等主编的《上海文化源流辞典》,“三井洋行,又名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上海支店。总行设在东京……后在天津、青岛、汉口、大连、安东(今丹东)、哈尔滨、厦门、广东等地陆续设置分支机构。”

三井财团早在1876年就开设了上海三井洋行,行址在四川路185号。三井洋行1888年和英美法德商人共同投资,在浦东设立了上海机器轧花局,由三井洋行负责经营。1893年三井洋行又与中国人创立的云龙公司合办了“云龙织棉厂”。三井财团在棉纺织业方面也有很大的利益,在1902年,上海华商兴泰纱厂被债主华道胜银行接管,后来被当时已经担任上海支店支行长的山本条太郎趁机买去。1905年,山本条太郎又租用华商大纯纱厂,之后改名三泰纱厂。

三井曾和三菱公司共同垄断对中国的贸易,操纵轮船运输和保险等业务。该行还对北洋政府提供政治借款,收集中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情报。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政府接收。由此可见,三井洋行在某种程度上和大生纱厂还存在业务竞争的关系,何况还是一家日资洋行。在这份合同背后,张謇及其创办的大生集团和三井洋行又有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?

查《张謇全集》,张謇有关三井最早的纪录是在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(1896.1.11)《致张之洞函》中:

再启,刘商桂馨在上海,闻将新设日商三井纱厂,探闻已合西商(新增纱厂五家,内三井、茂生、东兴是日商,怡和、公茂是西商)援董免税、丝不重税之例,请于译署,紗认正税……

此时张謇正在筹办大生纱厂,1896年,大生纱厂应该称为“通海纱丝厂”,为了能和外资企业抗争,张謇在致张之洞的信函中请求能够减免厘捐,减轻纱厂苛捐杂税的负担。

后张謇在《致袁树勋书》中再次提及三井洋行:

益业事,已与董老理清端绪,以后但须次第推行。厂甫增机,花须倍进,华盛、三井现均缓阁,正人弃我取之时。

可以看出此时张謇拟趁着华盛、三井等纱厂进展缓慢之际,努力筹资,进一步扩大大生纱厂的生产规模。

在事业发展的同时,张謇和三井洋行慢慢有了交集,和三井洋行的负责人(大班)有了交往。从1911年八月十九日(10月10日)张謇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:

贞壮讯,知昨夜十时半汉口获革命党人二,因大索,续获宪兵彭楚藩与刘汝奎及杨洪胜(开杂货铺),晨六七时事讫,各城俱闭,十时方开。余即于是时过江至汉口必业里纸厂事务所,语聚卿,即留午餐。三井大班丹羽来晤,旋谐之,并诣伟臣、晋笙、鸿洽。六时饮于海洞春。八时登舟,舟名“襄阳”。见武昌草湖门火作,盖工程营地,火作即长亘数十丈。火光中时见三角白光,殆枪门火也,闻十八日夜搜得党籍后续获二十多处而未已,余竟不安,遂

尔反侧枕。十时舟行,行二十里犹见火光。

1911年10月10日,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时候,张謇正好在武昌。张謇是10月4日到达武昌的,此行的目的是去接办湖北纺、布、麻、丝四厂。在武昌,张謇两次拜访了帮助自己取得湖北四厂承租权的湖广总督瑞徵,瑞徵设宴招待了他。7日,工厂正式开工。10日(阴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)晚八时,张謇登上“襄阳”轮启程返回。不久就看见武昌草湖门火光冲天,火光“横亘数十丈不已,火光中时见三角白光激射”。十时开船后,“舟行二十余里,犹见光熊熊上烛天也”。值得注意的是“三井大班丹羽来晤”,这是张謇日记中首次提及和三井洋行的负责人会晤,会晤的内容却不得而知。

1911年12月3日,南京光复后的第二天,张謇在上海第一次与革命党高层领导人章太炎、宋教仁、黄兴、于右任晤谈。两天以后,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举行了临时政府大元帅,副元帅选举。不久,在张謇等人的推动下,又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,敦促黄兴赶紧到南京组织临时政府,黄兴也“已商请张謇向日商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作为南京军政费的开支”。在《张謇全集》中收录了《为黄克强(黄兴)借款之保证书》(清宣统三年十一月1911.12—1912.1):

兹因黄君克强为中华民国组织临时政府之费用,向贵行借用上海通行银元三十万元。约定自交款日起一个月归还,并无抵押物。如还款期不如约,惟保证人是问。除息率及汇水,由黄君另订条件外,特具此书。三井洋行鉴存。

张謇

黄帝纪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十一月

(据张孝若《南通张季直先生传》)

根据已故南通文史专家管劲丞撰写的《张謇为南京临时政府筹款的经历》一文可知,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初期,面临极大的财政困难,日均花费三十万元左右,于是想责成商会在先前资助二十万外再资助五十万。张謇担心扰商,承认自行筹款。在除上述借款保证书外,民国元年(1912年)2月2日,张謇以大

革命烽火

恽代英与刘瑞龙的红色情缘

□苇航 清革

据《刘瑞龙的一生》记载,1924年秋,年仅14岁的刘瑞龙考入江苏省第一师范。校中红色氛围浓郁,晨光社成员已经与恽代英取得联系,常常将《向导》《中国青年》等革命书刊介绍给其他同学。新生刘瑞龙思想颇为进步,旁听晨光社的演讲等活动。

刘瑞龙接受光明的革命思想,除去晨光社,还有两条重要的途径。一是姨父顾怡生。顾先生时为江苏省第一师范教育主任。他教学经验丰富,思想开明,支持进步学子。他介绍刘瑞龙阅读《新青年》等进步书刊。

二是刘瑞龙与恽代英是亲属关系。刘瑞龙的姑妈是葛刘氏,嫁给葛湛清,生有一个女儿,名为葛季膺。她的丈夫正是恽子强。恽子强(1899—1963),曾用名恽代贤,祖籍江苏武进,生于湖北武汉,化学家,中科院院士。他还是恽代英的四弟,受恽代英的影响,恽子强、葛季膺伉俪先后加入共产党,从事革命活动。

五卅运动爆发时,他俩正在东北长春任教,因为支持学生参与运动,反对帝国主义,被校方解雇。于是,恽子强、葛季膺决定南下,奔向大革命的中心——广州。途中,他俩回南通完婚,看望亲友。表姐葛季膺讲起了长春的学生运动。在表姐的住处,刘瑞龙看到了大量的革命读物,有《共产党宣言》《共产主义ABC》《帝国主义浅说》《新社会观》等等。见到刘瑞龙喜欢阅读革命读物,表姐非常高兴地告诉他,这些书刊都是上海大学的恽代英教授寄来的。恽子强、葛季膺还给刘瑞龙讲起了恽代英在武昌创建青年进步团体的故事。刘瑞龙了解到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,已经成为当时长江中上游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想、新文化的重要阵地。最有趣的是,葛季膺鼓励刘瑞龙,学习恽代英的“太阳系”精神——人人都要做太阳,将周围的人像行星一样吸引过来,周围的人又将其他人像卫星一样吸引过来,传播革命思想,这样中国就有希望了。刘瑞龙学习恽代英,成立了南通师范革命青年社,团结了一批有为青年,包括顾民元、马尔聪等。

1927年3月的一天,南通葛家收到恽代英从武汉寄来的信函。恽代英在信中表示,希望刘瑞龙速来武汉,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院。北伐取得重大胜利,国民政府前往武汉办公。恽代英从广州来到武汉,负责黄埔军校分校——中央军事政治学院的日常工作。刘瑞龙喜出望外,向恽子强、葛季膺表达了报考中央军事政治学院的迫切希望。家人决定让葛松亭(刘瑞龙表兄、陈果夫同窗)护送刘瑞龙去上海,再从上海登船前往武汉。事与愿违,上海爆发了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”。共产党人、工人纠察队队员,纷纷遇难。刘瑞龙前往武汉的路,已经不通了,只能随表兄返回南通。